

中国 文化 老了吗？



中 国 老 了 吗 ？

这 等 于 问： 中 国 文 化 老 了 吗 ？

金克木 著



中华书局

中国
文化
老了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老了吗? /金克木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3
ISBN 978-7-101-11419-5

I. 中… II. 金… III. 中华文化-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6011 号

书 名 中国文化老了吗?
著 者 金克木
编 者 夏成绮
责任编辑 方韶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1/4 插页 4 字数 28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419-5
定 价 48.00 元



金克木晚年照

金克木
院落
太白
月夜
望山
人
宿
禅
院
落
月
望
山
人
宿
禅
院
落
月
望
山
人
宿
禅

金克木墨迹

金克木（一九一二至二〇〇〇年），祖籍安徽寿县，出生在江西。金克木一生的读书经历颇为传奇，三岁开始读书，开蒙老师是他的大嫂，教他读书的还有他的两位母亲。后来家庭变故，游学京城，出入旧书店和书摊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了短期的馆员。一九三八年赴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一九三九年落脚于湖南，曾在中学和大学里任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学，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回国。回国后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小学生大教授”的教书生涯。

金克木受过旧时私塾教育，传统文化的功底深厚，后来又历经曲折，沉浮人生，如他在“自撰火化铭”中自嘲的那样：“先生于农、工、商、军一一涉足而无以立足，于是以书生始，以书生终。”他做过多个行业，见识过各阶层人物，所以对“无文”文化也非常了解。金克木不仅精通传统文化，而且还精

通梵文、佛学等。说金克木是通人是不为过的，像他那样能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各个学科融会贯通的，近代以来很少见。读金克木论传统文化的文字，尤其会有这样的感受。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金克木却有着惊人的披沙拣金的能力，他拨开重重迷雾，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两部分，一是看得见的有文献记载的文化，二是看不见的隐文化即无文的文化。本书辑一将金克木探寻文献之根的文字做了一个汇总，他认为中国文化经过了与外来文化的结合，所以有两个根：一是中国本土思想的部分，也就是六部经；另外一个是外来的佛教部分，主要是翻译出来并流行的经中六部。这两个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文文化之根。本书辑二将金克木关于传统文化中的“无文”文化的文章汇集一起，从中我们可以读到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文字中没有记载或者说在文字之外，却是必须要了解的传统文化。金克木认为，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是隐文化、潜文化和无文的文化，那些文化不懂，也不可能懂得中国的文化。为了全面反映金克木的传统文化思想，本书辑三选取了金克木论述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些人物可能虚虚实实，有些还拉外国人来作陪一起论述，对传统人物的论述实际上也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这里论述的历史人物上到仓颉、周公，下到辜鸿铭、孙中山。

金克木在《文化之谜：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一文中说：“中国老了吗？这等于问：中国的文化老了吗？”他曾一直思考着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问题，也曾尝试着去回答，比如他在《古书

新试读》中就曾间接地回答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问题，他说：“今人读古书可以有和古人及外国人不同的读法，可以由语言及文体窥探思路，而且不妨由古见今，看出‘传’下来的‘统’，因而对思想‘化’入现代有益。”中国传统文化因能够不断地“传”下“统”来且思想能“化”入现代，生命力应该说是很强的。本书尝试着把金克木对传统文化思考呈现给读者，希望读者诸君能喜欢。

编 者

二〇一五年五月

首先，必须做一个实际上说不明白的说明：题目里的“智慧”指的是“东方式的智慧”，而“学术”则指的是“西方式的学术”。然而，即使勉强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也很难写明白金克木先生这个人。不过，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了解金先生呢？想到这点，我也就凭空冒出几分写这篇文章的勇气了。

金先生是在一九四九年前不久，由汤用彤先生推荐给季羡林先生，从武汉大学转入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的。自此以后，季、金两位先生的名字就和中国的印度学，特别是梵文巴利文研究分不开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只招收过两届梵文巴利文的本科班。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的那一班，就是由两位先生联袂讲授的。余生也晚，是一九八四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梵巴文的，当时季、金两位先生都已年过古稀，不再亲执教鞭了。季先生还担任着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每天都到外文楼那间狭小的房间

办公；金先生则似乎已经淡出江湖，很少出门了。因此，我和同学们见金先生的机会就远少于见季先生的机会。

虽说我见金先生远比见季先生少，但一般而言，却也要比别人见金先生多一些。我第一次见金先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奉一位同学转达的金先生命我前去的口谕，到朗润湖畔的十三公寓晋谒的。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在东语系的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万言的论印度六派哲学的文章。不知怎么，金先生居然看到了。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这在北大是颇为奇怪的）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说”。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法语、德语，自然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把着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一边叙述着自己身上的各种疾病，我也听不清楚，反正好像重要的器官都讲到了；一边还是英语、法语、德语、梵语和“这不对”，“搞错了”……最后的结束语居然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当然是我“搞错了”，难道还是金先生错不成？但是，当时的感觉实实在在是如雷贯耳，绝非醍醐灌顶。这种风格和季先生大不相同。我年少不更事，不懂得季先生的时间的宝贵，时常拿一

些自以为是的破文章向季先生请教。季先生未必都是鼓励，可是一定会给我开张详细的书单。有时甚至将我的破文章转给一些大学者，请他们提意见。有一篇讲日本佛教的，季先生就曾经请周一良、严绍先生看过。两位先生还都写了详尽的审阅意见，这使我没齿难忘。不过，季先生和金先生也有一点相同，就是也不管我懂不懂，开的书单也是英语、法语、德语、梵语。只不过一个说，一个是写。

但是，这通教训倒也并没有使我对金先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我再愚蠢也能感觉到“这不对”、“搞错了”的背后，是对反潮流式的来学梵文的一个小孩子的浓浓关爱。后来，我和金先生见面的机会还很不少。每次都能听到一些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有符号学、现象学、参照系、格式塔、边际效应、数理逻辑、量子力学、天体物理、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这些我都只能一头雾水傻傻地听着，照例都是金先生独奏，他似乎是从来不在乎有没有和声共鸣的。除了一次，绝对就这么一次，金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比三十二开本还小得多的外国书来，指着自己的铅笔批注，朝我一晃，我连是什么书也没有看清楚，书就被塞进了抽屉。此外，照例我也没有在金先生那里看到过什么书。几个小时一人独奏后，送我到门口，照例是一手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数说自己几乎全部的重要器官都出了毛病。结束语照例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上了。”我当然不会像初次见面那样多少有些信以为真了，于是连

“请保重”这样的安慰套话也懒得说，只是呵呵一笑，告辞，扬长而去。

慢慢地我发现，除了第一次把我叫去教训时，金先生谈的主要是和专业有关的话题，还很说了一些梵语，后来的谈话却全部和梵文巴利文专业如隔霄汉，风马牛不相及，天竺之音自然也再无福当面聆听了。金先生似乎更是一个“百科学”教授。每次谈话的结果，我只是一头雾水之上再添一头雾水。金先生在我这个晚辈学生的心中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传奇了。

课堂上是多少有点尊严的，但是，同学们不时也会忍不住向任课教师、一九六〇级的蒋忠新老师，打听一些有关金先生的问题；至少在课间，金先生绝对是话题。蒋老师也是一个奇人，他虽然从来不像金先生那样描述自己身体上的病，身体却实在是差。给我们上一个学年的课，居然医生会发出两次病危通知（后来好起来，现在很健康，前不久我还买到了他和另外两位老师合译的《故事海选》）。我跟蒋老师至少学到两手：一、评议学位论文“如果世界上真有满分的话，那么这篇论文就应该得满分”；二、冬天出门前，先将手伸到窗外，试探一下温度。总之，蒋老师是非常严谨的，更不会议论老师。不过，被一群小孩子逼得实在过不了关，也说了一件事。他们念书的时候，主要课程由季先生、金先生分任。季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照计划讲课，下课铃一响就下课，绝不拖堂；金先生则是一支粉笔，口若悬河，对下课铃充耳不闻，例行拖堂。

学生是调皮的，好奇心自然会延伸到想探探祖师爷的功夫到底有多高的问题上来。蒋老师是不会随便回答这样的问题的，长篇大论我们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又实在不甘心，变着法要套出个答案来。班上有位姓周的北京同学，是被分配到梵文专业来的，平时多数时间一身军装衣鞋不解高卧于军被里，要不就苦练吉他。人是聪明的。一次课上，他提出一个蒋老师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虽说梵文是死语言，但毕竟是能够说的呀，蒋老师是否应该请季先生、金先生各录一段梵文吟诵，让我们学习学习？蒋老师一口应承。下节课，蒋老师带来一盘带子。放前先说，季先生、金先生都很忙，不宜打扰。这是一盘金先生从前录的带子，大家可以学习。金先生的梵文是跟印度婆罗门学的，基本路数和我们中国过去背诵四书五经差不多。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我至今记得金先生的吟唱，可是至今无法描绘那种神秘、苍茫、悠扬、跌宕……

就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被吸进了白居易《琵琶行》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作冰不作水，从陈寅恪先生说）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疑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带子放完，课堂里仍是寂静。最早出声的是周同学，却只有两个字：“音乐。”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当时想不到，这竟然也是最后一次。吟唱后，同学们都垂头丧气。我们平时练习十分困难的梵文发音时，周围的同学都来嘲笑我们，说梵文里有马、牛、狗等等所有动物的声音，还拜托我们不要制造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合天上有”，要怪也只有怪我们自己实在凡俗。

如今回过头来看，梵文巴利文这种神圣的语言在今天的末法时节是几乎不可能存活的。大环境的压抑，早就使同学丧失了定力。而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则是对一九八四级梵文班同学学习梵文的自信心的一次美丽却严重的打击。大家不再抱怨什么了，梵文不仅不难听，相反她的美丽是那么地撼人心魄，但是谁都明白了，这份彻心彻肺的美丽又是那么地杳不可及。一九八四级梵文班过半数同学要求转系，就发生在这场吟诵之后不久。今天的结果是，一九八四级梵文班近乎全军覆没了。谁也无法，也没必要为此负责，但是我相信，金先生是预见到了的。

不久以后，我就到德国留学去了。八十年代末回到北大后，又心甘情愿地运交华盖，很快就离开了燕园。当时的情势和我的心情，或者是幼稚天真的乐观，使我连和师友告别的念头都没有动过。一直到金先生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再也没有听到他滔滔不绝的独自讲论，再也没有听到他数说自己的种种已有的和可能有的疾病，再也没有听到他“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

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的招牌结束语。

回到南方以后，我还是一直辗转听到金先生的消息。知道他一如既往地开讲，知道他一如既往地结束。心里总有一种蔚然的感觉。有一天，听一位刚见过金先生的朋友说，金先生打上电脑了：“一不留神就写上万把字。”不用那位朋友解释，我就知道这就是原汁原味的金氏话语。心里更是高兴。

金先生的文章也确实越来越多，《文汇读书周报》、《读书》隔三差五地发表。思路还是那样跳跃，文字还是那样清爽，议论还是那么犀利，语调还是那么诙谐。金先生的名声也随之超越了学术界，几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了。大家喜欢他的散文随笔，喜欢他的文化评论，其实也就是一句话，被他字里行间的智慧迷倒了。智慧总是和神秘联系在一起的，金先生也就渐渐成了一个文化传奇。

关于金先生的传奇在文化圈里的确很是流行，也颇有些人因为我是学梵文巴利文的，而向我打听求证。有的传奇是从金先生用笔名辛竺出版的《旧巢痕》、用本名出版的《天竺旧事》这两本自传体著作里生发出来的，虽然经过了读者的理解、阐释、揣测、发挥，多少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总还不算太离谱。不过，尽管这两本书都由三联书店出版，而且总的印数也不算少，但是，以我的感觉，真正的读者恐怕并不太多。大部分是耳食者兼传播者，而且传播的程度一般和耳食的程度成正比。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算作传播学的一条规律，好像事实如此。还不仅如此，传播者的

放大功能实在是厉害。个子矮小的金先生经过传奇放大，竟然使我觉得面目模糊起来了。我就举两个传奇吧。

一个有影子的，当然也不准确，是说，金先生回到国内，工作却不是那么容易找。正好某某大学法语教师出缺，当事者久闻金先生通晓多种外语的大名，就想当然地以为金先生自然也懂法语，就给金先生下了聘书。岂料金先生真正是“万宝全书缺只角”，偏偏就不会法语。但是，饭碗送上门来，又没有推回去的道理，更何况金先生还等饭下肚呢？于是，金先生就按照课本，照他一贯的做法开始闭门造车式的自学，保证比听讲的学生领先五到十课。这法语一教就是四年，四年下来，学生固然学会了法语，金先生的法语水平更是理所当然地在学生之上了。我之所以说这个传奇多少有点影子，首先是因为金先生的确是通法语的。其次，尽管我不知道金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法语的，但是，我知道金先生很早就通英语、德语、世界语，学会了这些语言，再去学法语，过来人都知道，确实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假使这件事是事实，也不必奇怪。因为，故事发生时金先生已经从印度回国，掌握了梵语巴利语，在上述的情况下学会法语，实在不值得奇怪。如果这也算得上传奇，端的反而有低估金先生的出人聪明的嫌疑了。

另一个传奇实在是连影子都没有了。北大盛产奇人怪人，金先生当然名列其中。不过，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就未必靠得住。北大是各种诙谐的顺口溜的出产地，比如北大有几怪。完整

的忘了，有两怪却是记得的：“金克木的手杖，周某某的拐。”后者说的也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的著名教授，他出门必要像不良于行者那样夹着双拐。只不过，他的双拐从来不点地，是双手提着，两脚却行走如飞的。这位老先生不服老，经常骑车。这就更精彩传奇了，双拐自然不可须臾离身，人在拐在，但要骑车，双手没空，好个老先生，居然将双拐夹在自行车后，在燕园里飞驰。“金克木的手杖”，则是讲金先生的手杖也从不点地，而是擎着朝天画圈挥舞的。这就靠不住了。我就经常见到金先生仗杖而行，手杖偶尔离地是免不了的，不过，一般确确实实是按照步律点地的。我不敢保证金先生的手杖没有朝天画圈的时候，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多的。手杖偶尔一朝天，就被放大传播成时时指天，这就像一个人抬起头做了一件什么事，或者说了一句什么话，就被说成是终身替天行道，终究是靠不住的。

有关金先生的传奇还有不少。在他去世后不久，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孔乙己外传》也可以当作金先生的自传，很是有趣，但也委实并不好读好懂，一如既往地扑朔迷离，时幻时真。“说了白说”、“白说也说”，再加上欲语还休的蕴藉，我想，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是注定难逃被索隐的宿命的。金先生的旧传奇会流传，新传奇会涌现，旧传奇会披上新衣，新传奇会蒙上旧颜。循环往复，终究难得止时。

既然迷倒了，也就顾不上那么许多。在公众眼里，一个学者的名声超越了学术界，有了不少传奇如影相随，那么此人浑身上